

# 心理学史是关于什么的历史？

〔英〕G.理查兹

英国心理学会设立了一个“哲学与历史部”，要求对心理学史的性质提出一种新的看法。本文中我愿尽绵薄之力，对此提出一些仍须予以充分论述的难题。首先我们看一看心理学史研究迄今有了什么进展？从本世纪初以来，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写他们学科的历史，例如，鲍德温的《心理学史》出版于1913年，布雷特的三卷本《心理学史》第一卷于1912年出版，同年德苏瓦的《心理学史概要》译成英文问世。这部早期著作显然意在为这一新生学科提供体面的系谱；只有鲍德温的著

作，五分之一是真正讨论十九世纪中期后的实验或实证心理学，而布雷特则是把这一科学研究实际上当作是心灵哲学史概观的末尾。至于亥姆霍兹、穆勒和布罗卡等生理学家，他们把心理学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的继承者，可以说是哲学的产儿。1929年波林出版了《实验心理学史》第一版，这部著作和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1928)一起统治了这一领域几十年，后者是一部份量较轻但涉及范围较广的入门教材。两者均再版了多次，墨菲的书于1972年又出版了新版(内容

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所失去的东西可能要比我们能够想象的多得多。

同样不清楚的是，分类学尤其无脊椎动物分类学，是否还象以前几十年那样继续遭到忽视。由于生态学和进化论的边缘学科目前显然引起了人们激动不已的兴趣，因此对于大学往往不愿支持对自然财富的系统描述和分类这种不显眼的“老式”事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的最后理解和管理的成绩绝对有赖于我们知道那儿有些什么！在1986年竟然发生了关于地球上物种总数究竟是接近五百万或五千万这样的争论，而目前分类的却不到二百万(见欧文，1983；威尔逊，1985)，这真是难以置信和令人愤慨的。当然大部分未知物种处在热带中，但是这决不是说全部如此。

在一般机制水平上而言，我们期望看到行为生态学和种群动态学相交处的进展。行

为生态学家一般关心的是自然选择如何定形个体行为和社会组织，他们很少过问全面种群动态的后果。另一方面，种群生物学家难得考虑人口统计参数(例如，依赖于密度的出生、死亡和迁徙率)怎样根据个体的基本行为进行推导。有迹象表明，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日益加强。例如，1984年由英国生态学会主办的专题讨论记录，题目就是《行为和动态学》(由西布利和史密斯主编，于1985年出版)。行为生态学家确有必要向上追溯行为的种群后果，同时种群生物学家也确有必要向下探索决定种群参数的个体行为。只有这样，吸引着生态学家们一个多世纪的种群和群落性状，才能通过个体行为，最终与定形它们的进化的压力联系起来。

(韩卫译自《American Scientist》，

Vol. 74, 1986, May-June. 周家斌，

张蕾，李天生 校)

扩充很多)。1930年开始出版《自传中的心理学史》丛书，现已出到第七卷(1980)，发表了老一辈名家的业务自传，具有不同水平的自我揭露、智慧和资料价值。但是，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心理学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称之为“心理学史”的分支，开拓者是美国已故的R. I. 华生。新的心理学史开始问世，包括坎特的有浓厚实证主义传统的《心理学的科学发展》第一卷(1963)和赫恩肖的《英国心理学简史》(1964)。1965年《行为科学史杂志》创刊，正式宣告了这一新分支学科的登场。以后事件证明了有必要作出更严格的评价。

作为一种笼统概观，可以说英语心理学(假如不包括德语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很大部分时间是为建立它的科学地位而奋斗，这个因素既导致了1912年以后行为主义的兴起，又反映了建立心理测验学的迫切要求。它的特征之一是心理学远比大多数其他学科更认真地对待科学哲学；心理学只有遵循科学哲学家所制定的如何成为科学的规则，才能确保自己的科学地位。于是，逻辑实证论特别在美国就产生了像赫尔的假设-演绎理论及其神秘的代数学以及各种术语的广泛使用定义的高奇产物。心理学由模仿科学变成了科学。因此，不足为奇，那些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力图在美国建立心理学史分支的人，会模仿现成的科学史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紧随库恩，寻求“范例”、“革命”、“正规科学”等角色的候选者。和美国心理学家爱好评价和论资排辈的一般倾向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后果，即最接近于华生编纂的简明心理学史文献目录(1974, 1976)的，是依据各时期杰出心理学家进行评级的问卷调查而编纂的。且不说经常需要在这一类文献目录中查找一些并不出名的人物，以及把本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九位学院心理学家”的判断接受为某种定案，显然更不合理的是拉瓦特、库姆以及威利斯等重要人物实际上都

未列入目录(尽管道尔顿仅有一篇十七页的关于颜色视觉的论文在目录中占有一席位)。华生承认库姆和威利斯本来应该列入目录，但对拉瓦特却只字不提(之所以有这明显的题外话，以后会清楚的)。

回到论证主线上来，在心理学早期力争同化于科学的反复尝试中，心理学史也力争同化于科学史，这一举动由于大多数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是心理学家而不是科学史家变得更容易了。

然而，这种研究是以某些未经证明的假设为主要论据，因而回避了一些真正有意义和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认为心理学史应该以当代历史学和科学哲学的传统术语来解释，它没有提出什么根本上独特或特殊的问题。当然，作为开端，我们较好的作法是尽可能严格地探明这种概念框架应用于心理学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地位是成问题的，它的历史既要说明又要探讨这个事实。但作为一种替代，特别是在美国，心理学史主要用作确立心理学的科学诚意的又一个竞技场。假如一个象样的称为心理学史的科学史分支得以创立，心理学的科学地位便能进一步合法化。于是，美国心理学史的性质，从鲍德温直到华生，仍然大都是相同的，华生自己写的《杰出的心理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1963)在七十年代成为标准的美国大学教科书。

心理学和科学史的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核心问题在此不能详述。心理学声称是行为科学；要成为科学是一种最强有力的行为方式，它的历史涉及许多心理学题材，如概念形成和概念改变的性质，交往、动机以及甚至知觉的性质等。因此，科学是心理学题材的一部分，心理学是超级的。相反，心理学在这一切中唯一要求的权威不过是它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的“科学化”，支持一种“成为科学的”超级意识形态。究竟心理学是蔑视“科学”，还是尊重科学？这个有趣的疑问只

有未来才能解决，但现在重要的是把它公诸于众。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是，考虑到历史编纂学研究中曾广泛涉及“内因论”和“外因论”角度的不同，来说明一下应用传统科学史概念于心理学史的难处。鉴于现在科学史家已很少有人会不加批判地利用这种不同，这两种观察角度的相互渗透长期以来一直很明显，在我们回到这一问题时或许需要阐明一些情况。这里要论证的是：就心理学情况看来，内因论和外因论区分的无效比通常设想的情况在逻辑上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这种区分的失效不论就心理学本身的特性或心理学史的理论意义而言，都是特别有启发性的（就心理学和科学史的总体看也都一样）。

我们先来考虑“psychology”一词\*。象许多学科名称一样，它既可指学科本身，又可指学科题材。但是，除阿基米德的排水特性外，我们并不需要研究某一物理学家的物理，才能理解他的物理学，或某一化学家的化学（道尔顿是酸性还是碱性？），才能弄清他的化学。英国科学史协会1984年夏季会议提出了一个可能的例外是德弗里的遗传学（据称假如隐藏在他推论背后的深刻动机之一是对他自己的同性恋提供一种遗传学解释，他的遗传才确实影响他的遗传学，但只有当他的遗传学正确时才能这样说），事实上他的遗传学并不正确。这一显然轻率的论点却能使看清一个事实：这种不切题的反论证并不适用于心理学。我们确实常常正是要提出这一类问题：华生的心理如何影响了他的心理学？或弗洛伊德的心理如何影响了弗洛伊德的？伯特的心理如何影响了伯特的？但这仅是我们问题的开始；请看下面一段引文：

习惯乃是……社会的巨型飞轮，及其最珍贵的维持力量。只有它才能使我们大家遵纪守法，拯救幸运的儿童免遭贫民出于妒忌的暴乱袭击，只有它才能防止最艰苦和最令人厌恶的生活道路被其中跋涉者

所遗弃。它使渔夫和水手冬天不离开大海；它使矿工安于黑暗中的生涯，并把村民牢牢地“钉”在小木屋里，……。它保护我们免遭荒漠和冰封地带土人的侵犯。它使我们注定沿着我们的教养或早年选择的路线，坚持在生活沙场上战斗到底，竭尽全力从事一项并不理想的事业，因为再没有其他适合我们去做的，而要从头开始又已太迟。它使不同社会阶层不相混淆，……。我们大多数人到三十岁时性格会象石膏一样定型不变，而不再软化，这对世界也是有益的。

这是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中论述习惯的一段话。我们现在来鉴别一下这一段话可能具有的某些作用。为了区分“psychology”一词的题材意义和学科意义，我将用大写的P代表学科意义，并继续沿用本文的惯例。甚至这样写也有难处，因为书写的习惯是用小写p代表两者，希望上下文能使两者的意义明确。

1. 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P) 这段文字是全书一部分，体现和包含了詹姆士对这门学科的专业贡献。作为他对习惯说明的一部分，这是他的心理学的一个样品，正如赖尔在《地质学原理》中的某一段文字是赖尔地质学的一个样品一样。

2. 威廉·詹姆士的心理(P) 熟识詹姆士的人能立即认出，这段文字是詹姆士处于某种沮丧心境下肆意发泄他的心情，以一种典型的詹姆士方式连续引述例证的作法，构筑出一种半悲剧的人类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景象。这是詹姆士自己的“心理”起作用的样品，召唤着一项心理学原理——习惯在人生舞台上登场演出。

3.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心理学(P) 由于詹姆士对创立这一民族传统是一位核心人

\* “psychology”一词，既可作为学科的名称，译为“心理学”，又可作为心理学的学科题材，译为“心理”。它所代表的涵义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译者注

物，这段文字也像任何一位他同时代人——杜威，鲍德温，霍尔的著作中的文字一样，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心理学。更具体地说，它属于讨论习惯性质的问题的著作，包括桑代克等其他人的贡献，并在以后几十年间导致了作为美国心理学主要特征的学习理论的发展。

4.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人的心理(P) 我们或许能在这段文字中进一步看到它的时代和它的来源地所特有的东西，它表明美国人如何观察世界，以及那些美国人所关心的事情——飞轮工业化形象，社会秩序潜伏的不安，对“我们教养和我们早年选择”的强调，而不是把遗传性看作是社会和人格的基础。假如它在其低沉的调子中并不代表这一时期和地域的某些特征，进一步考虑或许能揭示出它更密切地联系于詹姆士的社会阶级地位和社会环境，他是新英格兰超越论者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而对着二十世纪工业化北美的黎明。

虽然任何历史文献或写作确实都能在多种层次上分析，我愿特别强调，在上面引述的一段文字中，除“心理”本身以外再无其他“题材”，它是讨论心理的，而且它即是心理。它也是心理学。虽然可以证明解释水平的选择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的兴趣水平，但我要询问，既然这恰恰是一位心理学史家的问题，那么究竟哪一种兴趣是适当的层次呢？“心理学”一词含意不清是一件麻烦事，比如说“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心理学”这句话就有问题，而说“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物理学”就不会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题材意义包含着学科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对波林来说早已一清二楚，他在1950年出版的著作序言中写道：

我想……谈谈时代精神(Zeitgeist)和伟大人物在决定科学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表明这两种关于思潮的形成和出现的观点并非相互排斥的，而是每一种历史过程的正反面。

但他对于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理解是不够深刻的，仅限于指出了心理学“反映”着时代精神，把时代精神看作是某种心理学外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后者施加影响的，它决定哪些思想被接纳，哪些思想被拒绝。于是，蒂奇纳被说成是不合时代潮流，而弗洛伊德则是时代的“代表”。这是不合适的。心理学这门学科是直接“从心理”这一题材中涌现出来的。一种心理学理论的成功很可能是由这样一些因素决定的，如是否人们能在其中“看到他们自己”，它所包含的人生观是否和其他人不很明确的情感和认识相符合，总之，它是否能迎合当时人们希望心理学理论所满足的需要。但是，这些需要不论是从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算命占卜或从评价技术得来，都不是外在于心理学的，并不构成一种外在的时代精神。所有心理学家，不只是那些“伟大的”心理学家，都直接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因为他们各自的“心理”似乎都具有代表性，而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能够为心理学提供一些需要，对于这些需要，他们以及某些小说家、政治家、电影导演和广告公司经理在某种意义上要比他人看得更清楚，感受更深刻。

某些观察角度在其他学科中或许会被确认为“外因论的”，如居里夫人一意孤行的心理根源和戴蒙德《原型和先祖》一书中所讨论的在古生物学和对待科学化不断改变的态度之间的种种联系等等，在心理学中是不能排除的。

过去心理学工作的地位有一种迥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性，因为它总能作为题材论据重新解释。心理学有一个取样问题，其他学科大都可以假定题材的特性不会由于时间和地域不同而改变；波长为7699埃的吸收线表示有钾的存在，不论钾源近在十英尺或一千万光年以外。自然科学就是以这一假定为依据的，在科学宇宙学的建立中是否具有这一灼见是一个关键。心理学不能做出任何这

样的假设。我们不知道哪些心理现象是不变的，哪些是可变的，或许它们都是可塑的。在时间和地点改变时，它们肯定不会都保持不变。或许从克罗马努人到加利福尼亚人，性情不外是从愉快到别扭，从勤到懒，以及从认真负责到粗心大意，但某些十分重要的心理过程如感知和记忆，却会有很大差异（例如，在有文字以前的社会和有文字以后的社会，记忆的作用不同）。心理学历史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扩大取样的方式。这方面一个例证是关于“遵奉”(conformity)的研究。

本世纪四十年代末，一位被德国驱逐出境的犹太社会心理学家索罗门·阿希出于对奥威尔的温斯顿·史密斯的 $2 + 2$ 能等于5的测验的好奇，曾进行一些有关遵奉问题的实验，证明能让被试者把两条线中的一条长线“看”成短线。实验做法是让被试者进入一间有一些实验同谋在场的屋子，要求这些同谋报告显然错误的知觉印象。在这种压力下，大约三分之一的被试者陷入了圈套。若干年来，在一些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照例提到这一实验作为遵奉力量的证明。最近，佩林和斯宾塞重做了这一实验，但未能取得类似结果，从而引起了对这一课题的全面再审查。现在已经弄清，要理解阿希的实验结果，必须重新构想全部历史背景。当时社会地位很高的欧陆教授，面对的是认真谦恭的年轻美国大学生，他们生活在一种弥漫着遵奉气氛的文化中，遵奉在当时是一般科学幻想小说家、电影制作者、民歌手和社会评论家中流传甚广的成见。阿希实验正是一种能够表明当时美国心理性质的特别精致的证据，它是一种高度遵奉主义的文化，有三分之一大学生在相当轻度的团体压力下同意两条线中的长线是短的。阿希得出的结果并没有错。未能重复这一实验，并不象在其他学科中那样，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查原初的方法和程序，直到找出失误的原因（尽管未能重复一项心理学实验，通常当然仍会牵涉

进去）。进一步须强调说明的是，阿希实验和实验所研究的现象是不能分开的，实验本身即这一现象的一部分，进一层表明了强调遵奉的一般文化成见，正如后来美国社会心理学对种族主义偏见及其根源的研究是更广泛的民权运动的一部分一样。我们不能（即使在原则上）把“外因论”对阿希的影响和某种“内因论”观点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把遵奉研究的历史作为一项超越当时直接“外部”环境的研究课题。阿希不是“反映”时代精神，他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一种“容易理解的例证”：动物知识或心理物理学显然更接近于传统科学；我现时的意图仅是想强调一下，即使是对心理学的这些“硬”领域采取类似方法，我们也不能预先判断会有什么结果。

这一观点引导我们对心理学中的理论分歧和争论的性质进行重新审查。要说明这一点，举出三个例子就够了。第一是“行为主义对格式塔”的争论。这一冲突是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次的典型分歧。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宁愿选择整体论研究，而美国行为论者则偏爱原子论和还原论。在方法论上，行为主义者是头脑冷静的实验家，只关心外显的行为，而格式塔论者则宣称他们的经验研究是注重因果分析的，是依靠内省和论证，而不是依靠严格的实验。这是一种夸张讽刺的描述，但要点在于说明，传统“内因论”的英语解释会把这一争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问题，争论结局是行为论者以70对30取胜。很长时期以来我让我自己的学生注意引自华生和考夫卡的两段文字，我相信它们能够表明，争论的实质是“心理”这一题材的分歧，而不是科学程序或理论现状的分歧；反对崇拜偶像、乌托邦、技术乐观主义的华生，来自南部浸礼教地区，他面对的是和实利主义作战的有教养的犹太族欧陆知识阶层。下面是考夫卡一段文字：

意义和重要性在这种分子系统中不可能占有

任何位置；凯撒渡过鲁比肯河；某些刺激-反应情境；路德在沃尔姆斯；又是一些刺激-反应；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乐；一位埃及雕刻师雕刻纳弗瑞蒂特半身像；所有这些都还原为刺激-反应图式。……假如心理学是研究行为的科学，难道它不应该留给凯撒、莎士比亚、贝多芬一个真正的位置吗？这个位置给予这些人物在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们和历史学家的评价中享有同样崇高独特的地位。

下面是华生《行为主义》中的最后一段文字，它分明回响着南部地区布道说教的调子：

我希望能描绘出一个画面，表明我们能够把每一个健康儿童造就成怎样丰富多彩和美妙无比的人，只要我们能让他适当地塑造自己，并能在一个不受数千年民间传说束缚的世界中生活，不受可耻的政治历史阻挠，摆脱愚蠢风俗习惯的干扰（这些风俗习惯不仅自身毫无意义，而且把人锁扣在绷紧的钢带中）。我在此不是要求革命；不是要求人们去寻找被上帝遗弃的地方，组成一个聚居园地，赤身露体地过一种公社生活；我也不要求改变食谱去吃草根和树皮。我不要求“自由爱”。我试着用一种刺激物在你面前晃动，一种言语的刺激，如果照着去做，将逐渐改变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是会改变的，只要你不是在放荡的自由，而是在行为主义者的自由中抚养孩子。这种自由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用言词描绘，因为我们今天还知之甚少。难道这些孩子不能转过来以他们较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来取代我们社会，并以一种更科学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孩子，直到这世界最终变成一个适合人类聚居的地方吗？

第二个领域是发展心理学或儿童心理学。这里两极化虽不明显，也有几种不同的“心理”潜伏在各种心理学理论背后，其中之一在埃伦赖希和英格利希的论战著作中有详尽讨论，它从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兴盛了几十年。华生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虽然他只是许多代表人物之一。在他们看来，儿童的基本形象是洛克式的，儿童

是无限柔顺的，为了创造一个理想社会和个人幸福，我们只需要以自律、勤勉、感情自控等等有关美德训练儿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追踪个人进步和估计他或她的需要，这当然又要有一种评定技术。在欧洲则流行着不同形象。瑞士皮亚杰更明显地是另一传统的继承人，它可以上溯到卢梭，经由伊塔德、佩斯塔罗奇、弗罗贝尔、低能治疗开拓者古根比尔和塞甘，以及更近期的普赖尔、施特恩和克拉巴莱德而传递下来。在这一传统中，把儿童看作展现他的潜能，施特恩把这一过程称为“整体自我发展”。教育者的任务类似园丁，是帮助儿童成长，发展他的才能，对付他的缺陷等等。因此，皮亚杰的儿童发展模型和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的模型方向完全不同，但不同不在于儿童发展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其根源是预先作出设想：儿童是什么？以及应如何对待他们？这是一种横跨“心理”和“心理学”两种意义的不同。在意大利和英国，进一步差异可以在儿童心理学的心理题材方面发现。例如，蒙特索里利用的是隆布罗索的相貌人类学，而在英国，方法层次上的心理测量研究，则是和来自高尔顿和萨利的传统而在伯特研究中典型化的更倾向遗传的理论模型结合在一起；但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心理分析趋向，这在今天的美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心理学的理论建立和方法论以及选题的国别差异，实际上来自这些社会之间的心理差异，并且十分清楚地表现出这些差异。

第三，任何概述心理学史的文章，必须引述高尔顿后才是完整的。这里是在《人类才能的探究》一书中关于意象研究的情况。他不带感情色彩地记录了斯通丝小姐——“一个女子高中的主任教师”的一封信，这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上层阶级的心理学和心理融合在一起：

英语母音在我想到它们时似乎总是带有某些颜色，随信附上我对此所做的图解。子音自身

在我想象中是紫黑色，但在整个字的想象中，子音颜色偏向母音颜色。例如，在“Tuesday”（星期二）一词中，我单独想象每一字母时子音呈紫黑色，u呈淡灰红色，e呈浅宝石绿色，a呈黄色；但当我想象整个字时，前半截是浅灰绿色，后半截是黄色。

接下去她又说：

或许你会对我妹妹关于她的特殊视觉的记述感兴趣：“当我想象Wednesday（星期三）一词时，我看到的是淡黄鲜绿色的椭圆形，Thursday（星期四）是褐红色的不规则多边形，Friday（星期五）是暗黄色腊肠。

很难想象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有什么女子高中主任教师会如此愉快地沉迷在这样的自我心理揭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纳粹心理学家雅恩施(E. R. Jaensch)关于S和J两种人格类型的鉴别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心理学中，它们后来被称为专制型人格和民主型人格的映象。雅利安J型人格是意志坚定，训练有素，善于服从，不耽于幻想，而S型人格则是不修边幅，昏头昏脑，空想柔弱，特别容易产生联觉意象。带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表明了纳粹对退化和种族纯化的关注也是来自高尔顿的优生学，虽然只有一部分是如此，在心理学范围内，雅恩施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是仍然关心视觉意象的少数人之一，视觉意象是由高尔顿在刚才引述的著作中作为一个课题而提出的，虽然这个课题后来又恢复了。因此，同一种心理现象，同一项研究课题，能戏剧性地改变它的心理学意义，而这种改变是随着研究时的心理环境的改变而引起的。

过去的心理学在两方面和现在的心理学有关：(1)过去心理学家的观察具有的价值类似早期天文或气象观察对现在天文学家 and 气象学家的价值；例如，阿希的遵奉实验能给予我们在这些实验时期遵奉水平的测度，使我们选择范围在时间上加以扩展；(2)更深刻地看，过去心理学家的的工作本身体现了过去的心理(题材意义上的)，凭它本身的质

量就变成心理资料。这两个方面，特别是后一方面预先排除了维持内因/外因差别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以如此复杂方式相互作用，而是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不能分开的。没有什么“时代精神”和“伟大人物”，只有心理的层次，其中一个层次已被正式尊称为心理学。

假如我的观点不被误解，我还要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心理学概念的改变总是亦步亦趋地尾随社会中科学概念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我自己的观点是：任何种类的心理概念(或许可以称之为心理学语言)，只能由我们称作世界语言或世界概念的反身应用产生。词源学和逻辑学都能用来证明这一论点，但在这里不能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只需说，假如这一观点正确，情况就会比本文描绘的景象要好些，相对论性和分裂繁殖要少些。但这又一次把心理学和科学的关系放在中心位置，因为心理学历史变成了探索科学发明等等作为心理现象映象的反身意义的历史。最近有几篇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例如，丹齐格尔和卡斯勒的)，但是就本文提出的主要论点看，有必要扩充这一模型，使我们能够联系科学思想和技术革新在社会上引起的心理结果来观察一般科学史，而这些心理现象又反过来为构成正式“心理学”或它的非正式先驱添加了燃料。

理解很近期的美国心理学时，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握住处于核心地位的一种心理现象，即美国心理学家偏于研究舆论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以及与反馈有关的态度等等。不论在市场交易和总统选举中，或在社会改革运动或小学班代表选举中，对他人进行评级和评价，力图弄清他人如何评价你自己，是美国心理生活的一个恒常特征，这即是李斯曼说的美国“他向态度”，这也是美国心理学史的一个特征，华生的参考文献可以作证。本文到此已使问题自圆其说。关于心理学的文化根由，关于内因观和外因观的融合以及心理学

和心理的融合，除下述事实，即研究心理学历史这门分支学科的主要参考书竟如此公然地从它的作者受时代和地域约束的特定假设和倾向并从 R. I. 华生和美国社会两者的心理汲取力量形成自己的性格外，还能有什么更清楚的说明呢？这里另一个因素自然仍是那种某地特有的和物理科学在科学地位上平起平坐的心理需要，如本文上文所提及的。

我愿把本文中试图阐明的论点摘要概述如下：

1. 预先假设心理学史仅是科学史的又一支，是过早和武断的。

2. 作为一个例子，甚至可以说内因论和外因论之间的区分，在心理学史中也不能得到认可，因为：（1）心理学著作只能理解为个别心理学家的心理的产物和他或她进行工作时所在阶级和社会的心理的产物；（2）“psychology”一词的内在模糊性是既可作为题材，又可作为学科两种意义理解，表明了心理学工作的现状有一种真正的模糊性，即它既可以作为一种题材研究，又可以凭它自身的权利作为一种研究资料；（3）心理学史因而不断地从学科历史向题材历史过渡，题材史在最后分析中是“外在的”（或“外在的”一部分），是外在论者研究其他学科时也会涉及到的。

3. 在一种不那么抽象的层次上，心理学史可以看作在理论上和现时的心理学仍然有关，作为一种扩充的选择范围方式，因为过去的心理学实验和调查保留着一种内在的、现时仍然有效的价值，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是少见的，而且绝非正常的，也许只有天文学以及考古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的原始学科是例外。

4. 因此心理学史最好是去探索并弄清楚许多模糊不清和似乎矛盾的问题，这是因为它的处境既和科学史有关，又和科学哲学有关而引起的；不要为了面子去抹煞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能重视这些问题，科学史其他分支肯定不会尊重我们，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它们或许会发现我们更为有趣，更为切题。

那么，“心理学史是关于什么的历史呢？”从笔者看来，似乎越来越像是：心理学这门学科史也就是心理这一题材的历史。这是一种移位说法。假如我们决定直接转移到心理这一命题上，那么又有什么历史不会成为心理的历史呢？

（林方译自《British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1987，No. 20，pp. 201—

211，李天生校）